

聆听大师的内心独白



费希特书 信选

[德] 费希特 / 著
洪汉鼎 倪梁康 / 译

Prof. Johann Gottlieb Fichte

839164

费希特书信选

聆听大师的内心独白



[德] 费希特 / 著
洪汉鼎 倪梁康 / 译

名人传世信札
大师私人话语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费希特书信选 / (德) 费希特著; 洪汉鼎, 倪梁康

译. — 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17.11

(名人传世信札 / 金惠敏主编)

ISBN 978-7-5158-2290-7

I. ①费… II. ①费… ②洪… ③倪… III. ①费希特

(Fichte, Johann Gottlich 1762-1814) — 书信集 IV.

① B516.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1090 号

费希特书信选

作 著: [德] 费希特

译 著: 洪汉鼎 倪梁康

责任编辑: 李 瑛 袁一鸣

装帧设计: 北京东方视点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责任审读: 李 征

责任印制: 迈致红

出版发行: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字 数: 170 千字

印 张: 10

书 号: ISBN 978-7-5158-2290-7

定 价: 48.00 元

服务热线: 010-58301130

销售热线: 010-58302813

地址邮编: 北京市西城区西环广场 A 座
19-20 层, 100044

<http://www.chgslcbs.cn>

E-mail: cicap1202@sina.com (营销中心)

E-mail: gslzbs@sina.com (总编室)

工商联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

联系电话: 010-58302915

作者简介

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系德国古典哲学中承前启后的主要哲学家。他有着戏剧般的一生，不仅是书斋里的哲学教授，还是不断追求社会进步的积极实践家。法国大革命一爆发，作为民主主义者的费希特就积极地站在法国革命这一边，希望欧洲封建国家能实行某种社会变革，而当拿破仑背叛革命，变成欧洲各国的侵略者时，作为爱国主义者的费希特立即投身于抗击法国侵略者的自由解放战争之中。他死于1814年，这年正是全欧反拿破仑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临终前听说普鲁士大元帅越过莱茵河，他带着胜利的喜悦，欣然离开人世。

译者简介

洪汉鼎，男，1938年生于南京。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3年获联邦德国洪堡研究基金，在德国进修和讲学两年。1991年荣获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哲学名誉博士，并于1995年任该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现任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和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主要著作有：《费希特，行动的呐喊》(1988)、《斯宾诺莎与德国哲学》(德文版1989)、《语言学的转向》(1992)《斯宾诺莎哲学研究》(1993)和《费希特》(1996)等；译著有《逻辑学的发展》(1985)、《真理与方法》(1992)、《斯宾诺莎书信集》(1993)和《哲学百年》(1996)等。

倪梁康，男，1956年生于南京。198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语系，1985年获南京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90年于联邦德国弗赖堡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在卡塞尔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96年获德国洪堡研究基金，在乌珀塔尔大学研究胡塞尔。现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著作有《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存在信仰》(博士论文，德文)、《现象学及其效应》(1994)、《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1999)等；译著有《现象学的观念》(1986)、《现象学的方法》(1994)、《逻辑研究》(1994)、《胡塞尔选集》(1997)等。

总 序

金惠敏

从来就有一个私语的世界，只要您认可人是社会性的动物。私人性和社会性永远相反而相成。

然而由于传统的宏大叙述的霸权，这一世界尚未充分展露，这种话语尚未得到足够的承认。今天，该是打破宏大叙述一统天下的时候了。无论从哪方面说，私人话语都具有与公众话语同等的重要性。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私人话语甚至更具决定性或优先性。

例如，如果把阅读和批评作为对另一个心灵的探问，与它碰撞、对话、交流，那么可能没有比通过书信（包括日记）等这类被宏大叙述视为次文本更捷径的方式了。在所谓的正文本即通常所称的作品中，原作者之意盖不在表现，而在表演，即是说，在伪装自己，至少不是在直接地表现自己。如俄国形式主义所发现的，“文学性即是陌生化”，即以造成某种接受障

碍为美、为艺术或学术。现代主义大诗人艾略特因而特别宣称：“诗不是表现情感，而是逃避情感。”面对公众读者，作者总是代表“理性”“良知”“社会责任”在说话；他总是把自己作为对象，耿耿于怎样给公众塑造一个完美的形象。而在书信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由于面对的是亲朋好友，作者卸下了一切社会性面具，轻松随意地袒露出自己的本真面目。他是纯粹的主体，专注于倾诉，而不是把自己当成一件有待完成的艺术品。这里不需要精雕细刻、深思熟虑。

德国生命哲学家齐美尔断言：“生命并非完全是社会性的。”与其差不多同时代的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灵划分为意识与潜意识。这里如果把作者的正文本比作意识，那么其次文本即书信等则是潜意识。而潜意识是水面下的冰山，要比显露出来的那部分巨大得多。要深入一个心灵的世界，仅知其正文本最多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而只有同时了解了他的次文本，才可能真正地把握这位作者。因此，美国现象学批评家有理由认为，对于游历一位伟大的心灵来说，书信、日记、便条、眉批、笔记等的作用绝不亚于其刻意创作出来的作品。

通过这一书系，我们试图证明书信具有独立的价值：它是抒情的、亲切的美文；它是作者内在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自然袒露；它是人类一种特殊的情感方式和审美方式。简言之，

我们的目的是培养一种与公众性阅读相辉映的私密性阅读。

为方便查阅，丛书在每封信前都加有提示性标题，或为作者原话，或为编译者的概括。

是为序。

译者序

洪汉鼎

约翰·哥特利勃·费希特 (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 出生于德国上劳西茨州拉梅诺地区的一个织麻线带的手工业者家庭。兄弟姐妹共 8 人，他居长。按照家庭的经济状况，他本来是不会受到什么优良教育的，但由于他天资聪慧，特别是具有一种惊人的记忆力，他个人的命运经历了一次“奇迹”。在他 9 岁那年，济本爱欣地区的一位男爵密尔铁兹到他村里访友，顺便想听一下该村有名的牧师的布道，可惜来迟了，布道已经结束。谁知村人告诉他，该村幼童费希特有一种特异的天才，他能把当天牧师布道的内容全部背诵出来。当这位男爵听了费希特绘声绘色的背诵之后，惊叹不已，他决定资助费希特上学，以使他将来成为一名出色的传教士。就这样，费希特从 1771 年开始，先后在尼德劳和迈森地区读书。

1774 年当费希特 12 岁时，他被送到拉姆堡著名的普福塔

贵族学校学习。在这所学校里，费希特因出身低贱而备受同学的欺凌，但他天性顽强，不甘受辱。有次他决定效仿鲁宾逊，以逃走来表示反抗，虽然最后仍被带回到学校，但同学们已不再敢欺负他了。在中学时，对他影响比较深的有两个人，一是对狂飙突进运动起了很大推进作用的诗人克罗普斯托克，一是莱辛。莱辛的书当时在学校里是禁书，他秘密地借来阅读。莱辛对真和善的信念以及对历史的见解深深打动了少年费希特的心灵世界，以致他曾想在成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访莱辛，可是这位卓越的人物不久不幸去世，致使费希特的愿望未能实现。

1780年秋，费希特进入耶拿大学，翌年转入莱比锡大学学习神学。给他安排的目标原是做一名普通的传教士，但费希特对神学毫无兴趣，有些必修的神学课程也未完成。因此当他大学毕业后，找不到确定的职业，加之他的恩人密尔铁兹早已去世，经济资助逐渐断绝，以致他自1784年开始不得不在萨克森附近地区许多人家担任短期的私人教师，以资糊口。1788年，他的朋友魏斯宏为他在瑞士找到了一个职务，这样，费希特在同年秋天来到苏黎世一位旅馆老板奥托家担任一个10岁男孩和一个7岁女孩的家庭教师，但由于这个家庭对孩子的教育异常放纵，不满意费希特的严格施教，一年半以后，费希特终于提出辞职，又从苏黎世回到了莱比锡。

在苏黎世，对费希特一生发生重大影响的一件事，是他结识了克罗普斯托克的一家亲戚哈特曼·拉恩，并因而与这家的独生女约翰娜·拉恩产生了爱情。虽然时间是短促的，但他们的爱情却是忠贞和坚实的。约翰娜虽然没有什么惊人的外表和高度的精神教养，但深切了解和同情费希特的事业，日后一直分享费希特坎坷不平的命运。1790年3月底，在费希特离开苏黎世的前夕，他们终于订了婚。

费希特离开苏黎世本有许多打算，或者到宫廷担任一位王子的教师，或者办一个文学杂志，向公众推荐有益的书籍，或者创办一所修辞学校，培养演说人才，但这些计划最后都落空了。这样他不得不在莱比锡附近农村极不情愿地重新操起家庭教师这一行当。1790年7月，正当他前途渺茫不定的时候，他偶然阅读了几本康德哲学的书，从此在他的精神生活中产生了一场革命。正如他在给魏斯宏的信中所说：“自从我读了《实践理性批判》后，我进入了一个新天地。我曾经相信是不可驳倒的原则，现在在我看来是被驳倒了；我曾经相信是永远不能被证明的事情，例如绝对自由的观念、义务的观念等，现在在我看来是被证明了。我简直成了一个乐天派。”在费希特看来，康德哲学对于“一个道德从根基里就已败坏的时代”，将是一副最有效的根治剂。他决心以毕生的精力致力于研究和发挥这

一哲学。费希特最初的打算是把康德哲学通俗化，使之为一般平民群众所理解，从而在尘世的实际生活中产生影响。他的第一篇著作是一篇阐释《判断力批判》的文章，但这篇文章当时未得发表。

1791年费希特本来打算回苏黎世与约翰娜·拉恩完婚，但由于拉恩父亲的一家商行倒闭，结婚暂时受到影响。这样，费希特在同年4月去华沙担任一位伯爵夫人的家庭教师，但因女主人态度傲慢，不到两个月，费希特就离开华沙。在返回途中，费希特取道到哥尼斯堡拜访康德，希望在他那里能找到自己一生的美好前途。为了得到康德的重视，费希特想以自己的第一篇著作作为推荐信，这样他独居哥尼斯堡旅馆，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写成《试评一切天启》一书，并立即送呈康德审阅。康德不久就接待了他，并邀他同桌进餐。可是这时费希特的资斧用罄，不得已向康德写了一封极为恳切的信，请求康德能资助他一些盘缠回到老家去，但可怜的可德也无能力帮助这个年轻人，他只是建议他出版这部著作，并介绍给他一个出版商。经过一些书报检查的纠纷，《试评一切天启》终于在1792年出版。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该书出版时漏印了作者姓名，以致普遍认为这是康德的又一部重要著作。康德最后不得不发表更正声明，费希特的哲学名声因而大振。

1793年6月，费希特终于回到了苏黎世，并于10月12日与约翰娜·拉恩在巴登举行了婚礼。这年费希特匿名发表了两篇著作：《为纠正公众对法国革命的判断进一言》和《向欧洲各国君主索回至今还被压制的思想自由》。这两篇战斗檄文热情地讴歌了法国大革命，并尖锐地对封建专制主义展开了批判，在欧洲思想界引起极大的反响。费希特作为民主主义战士而成了显赫一时的人物。不久，耶拿大学邀请他担任哲学教授，费希特梦寐以求的前途终于摆在他的面前。

1794年5月18日，费希特带着无比兴奋的心情以及他所筹划的自己的哲学体系即知识学到达耶拿。原先的哲学教授赖因霍尔德到基尔大学去任教，因而耶拿现在是费希特的知识学取代了赖因霍尔德的“未名哲学”，正如当时耶拿讲师福尔贝格所说：“赖因霍尔德走后，他的哲学，至少在我们中间是跟着死去了。‘未名哲学’在学生头脑里已消失得一干二净，对赖因霍尔德的倾慕，从来没有达到景仰费希特的程度。”当费希特开讲知识学时，大学里最大的讲堂都容纳不下听众，走廊里、院子里、窗台上到处挤满了人，一时间“自我”与“非我”，取代了“质料”与“形式”，成了哲学的时髦语。谁要想成为一个哲学家，谁就要了解知识学。施雷格尔曾把费希特的知识学和法国大革命、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相提并论，称之为

他那个世纪的最伟大的三大成就。

耶拿时期无疑是费希特系统建立和发展他的知识学的重要时期，他在这里一方面开了知识学的专题讲座，另一方面又开了知识学应用的通俗讲演。在专题讲座中，首先讲了“论知识学或所谓哲学的概念”，然后分别讲解知识学基础；在通俗讲演中，首先讲了“知识学的伦理学”，而后开讲“学者的使命”等。根据这些讲座，费希特在这里写就了他的一些重要哲学著作，如《全部知识学基础》（1774）、《论学者的使命》（1774）、《知识学性质概论》（1795）、《知识学原理下的自然法基础》（1796）、《知识学两篇导论》（1797）、《试对知识学的一个新阐述》（1797）、《知识学原理下的伦理学体系》（1798）。除了讲演和写作外，他还和尼特海默尔在1795年创办了《哲学杂志》，并且为席勒主编的《时序》杂志撰稿，以扩大他的知识学的影响。

费希特这时可以说成了青年人崇拜的偶像，正如黑格尔1794年告诉谢林的：“蒂宾根神学院境况如何？除非有一个像赖因霍尔德或费希特那样的人物在那里主持讲座，否则事情不会发生太多变化。”而在蒂宾根的谢林则在1795年写给黑格尔的信中热情地说：“费希特把哲学提到一个高峰，而迄今的康德主义者，大多数只在这个高峰之前头晕目眩。……如果我能成为在真理国度首先欢迎新英雄费希特的那些人中的一员，我

是很幸福的。向伟大的人物致敬！他在完成着伟大的事业！”

但是，正当费希特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时，他的敌人，特别是宗教政治界的庸人就越来越害怕，因此他们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暗中陷害和公开打击，其中有四次严重的冲突把费希特弄得狼狈不堪，最后终于在1799年被无理逐出耶拿。

冲突首先是由他以前匿名发表的两篇热情歌颂法国革命和尖锐批判封建专制的政治论文引起的。反对他的封建卫道士和教会反动派得悉这两篇论文是费希特所撰写时，立即把矛头对准了他。他们决不想让这样一个人在他们的大学里公开讲演，于是造谣说他在《学者的使命》讲座中主张“20~30年内可能任何地方都不再有君主和国王大臣存在”。实际上费希特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因此最后查无实据，但他的反对者并未因此而停止对他的攻击。

第二次冲突起因于他的课外讲演的时间。鉴于每星期的课程都排满了，费希特选择星期日上午10—11时作为他对广大听众做公开讲演的时间，谁知宗教界反对派故意挑衅说，这是有意阻止听众星期日上教堂做礼拜，是“违反国家礼拜的一个蓄意的步骤”，试图以此迫使耶拿大学勒令费希特停讲。费希特坚决不服，他在给魏玛当局的信中责问道：“难道有个禁止教授在星期日讲课的法律吗？而且为什么其他教授在星期日能

举行物理学讨论会，我就不能举办公开讲座？”鉴于费希特的理由充分和学生的支持，魏玛当局决定不撤销他的讲座，但为了不影响听众上教堂做礼拜，讲演时间改为星期日下午。

第三次冲突发生在他和大学生教团之间。当时耶拿大学生中有三个秘密教团，这些教团各有自己公私生活准则，目中无人，为所欲为，并且都有政府和宗教势力支持。费希特痛感这种教团组织有碍于学生道德品质的提高，有碍学术自由，竭力主张解散这些教团。在费希特的耐心教导后，这三个教团终于有所觉悟，并派代表来见费希特，请费希特主持他们的悔过宣誓，费希特认为此事最好由学校当局出面，答应在他们和学校当局之间进行调解。谁知此事传到魏玛公爵处后，其下令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调查处理此事。这样反对派就乘机挑拨说费希特从中搞了两面三刀，并煽动一群不明真相的人在1795年元旦之夜包围了费希特的住宅，将窗户砸破，在大街上公然对他的夫人进行侮辱。费希特处境相当危险，最后不得已暂住耶拿附近的奥斯曼城几个月，以避风险。

第四次冲突最严重，涉及面广，终于导致费希特离开耶拿，这就是所谓“无神论事件”。1798年，早先在耶拿大学、后在一所中学当校长的福尔贝格向费希特主编的《哲学杂志》寄去了一篇名为《宗教观念的发展》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

是把宗教看成实践的，由善良的行为所构成，因此根本不需要信仰，信仰上帝既不能通过经验，也不能通过思辨来论证。费希特不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怀疑主义的无神论”，但他不愿意以编者的权威压制不同观点的文章发表，他原想在该文前面加上一个批判性的评注，但福尔贝格不同意，于是他就自己另写了一篇文章《论我们信仰上帝统治世界的根据》，于1798年与福尔贝格的文章同时在《哲学杂志》上发表。按照费希特的看法，宗教固然是由道德行为构成的，但道德行为和对超验道德世界秩序的信仰乃是同一回事，因此宗教就是信仰。可是费希特的敌人不顾费希特和福尔贝格之间的差别，企图以此中伤费希特。首先他们匿名散发一篇叫作《一个父亲就费希特和福尔贝格的无神论写给他的上大学的儿子的信》的文章，文中控告费希特以无神论毒害子女，并且迫使萨克森政府没收费希特主编的《哲学杂志》，进而还向魏玛当局提出对费希特的法律控告。费希特识破了敌人的阴谋，立即写了两篇申辩文章，一篇是《费希特向公众的呼吁》（1799），另一篇是《〈哲学杂志〉编者对无神论控告的法律答辩书》（1799），其中明确地指出“他们（指他的敌人）要迫害的，并不是我的无神论，而是我的民主主义，前者只是一个导火线”，“在他们看来，我是一个民主派，一个雅各宾党人，事情就是这样”，并且为